



“蝇蛆行动”:扭转中国战场的一次战略空运

1944年4月17日,日军动员52万兵力发起“一号作战”,这是日本对中国正面战场发起的最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战线上只能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前景忧心忡忡,因此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要求他迅速将所有兵将都转交盟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

然而这并未挽救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危机,直到1944年12月为止,美国援华第14航空队位于衡阳、零陵、桂林、柳州的地基相继沦陷,日军先遣部队进入贵州独山,直接威胁昆明与陪都重庆的安全。昆明是美军从英属印度经“驼峰航线”向中国战场“输血”的重要基地。于是魏德迈决定将部分在缅甸作战的中国驻印军迅速调回国内,抵抗日军兵锋。

当时的缅甸战场,同盟国已完成对缅甸北部的反攻。于是,魏德迈决定从中国驻印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中抽调第14师与新编22师送回中国内地。依据北方战区司令部参谋人员评估,这场代号为“蝇蛆行动”的军事行动将会推迟滇缅公路打通计划约一

个月到六周时间,而身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的英属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也对该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将那么多的运输机投入运送国民党军队回国的行动,对盟国在东南亚的反攻计划是一种“浪费”,但这没有动摇魏德迈保卫中国大后方的立场。

根据同盟国方面的安排,“蝇蛆行动”以缅甸五座机场为基点,分别是萨茂、瓦拉渣、南新与密支那的北、南机场,另外英属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机场也被纳入这项行动。

“蝇蛆行动”由第10航空队司令霍华德·戴维森将全权指挥,并由其副司令格鲁伯斯上校负责以口头命令方式监督空运部队进程,这是因为部队在移动时所遭遇的变故非常多,因此通过口头下达即时命令远比文书履行更符合实际情况。另外,基于中国境内缺乏现代化地面交通设施,美军干脆“好人做到家”,决定运送大批马匹和驴子与中国军人一起回国,以加强部队的机动性,牲口的输送特别交由第1空中突击大队的第319运兵中队与第2空中突击大队的第317运兵中队执行。

出发前,美军机组发现飞



机水平尾翼被中国官兵拿来当黑板,写上许多汉字,仔细识别其中的内容,有“到达了外国必须……”以及“礼、信、义、孝”等字眼(见图),似乎是军官教导搭机士兵出国以后的规矩,这也反映出当时新六军基层军官并不知道他们此行是要回国作战。

在第10航空队、空运司令部、北方战区司令部以及新六军官兵的配合下,“蝇蛆行动”从1944年12月2日到1945年1月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有1596匹驮马与驴子、42辆吉普车、48门75毫米山炮、42门4.2英寸迫击炮、48门37毫米反坦克炮被先后运抵中国的陆良、沾益、昆明、呈贡、楚雄等机场。人员部分,则有20105名中国官兵以及249名美军通过空运迅速进入中国,前者除了第14师与新22师之外,还有新六军军部,后者则是美军第1重迫击炮团,第

45、60野战医院以及第988通信连。

在执行作战任务的24天内,空运总队印中师只损失了3架C-47运输机,而在运送动物的时刻,也只发生了一次马匹在空中抓狂的意外事件(最后被机组成功驯服),可以说是驼峰空运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作战任务。

“蝇蛆行动”是中国境内历史上首次战略空运行动。由于有了经验,稍后盟军空运司令部印中师的第2空运中队又展现出令日军望尘莫及的空中运输能力,其中在1945年1月22日的一天之内,居然能在日军攻占江西遂川、赣州前夕将两座基地内的盟军官兵全部转移。而当日军于1945年4月对中国发动旨在夺取芷江的最后一场战略攻势时,空运司令部也依据“蝇蛆行动”的经验,制订“鸡公行动”,迅速将早先由缅甸运往云南的新六军再次空运到湖南前线,配合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以及王敬久的第10方面军,共同粉碎日本第20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总算在正面战场上进入“转守为攻”的状态。

(摘自《档案春秋》雷炎/文)

唐代为何动不动就“贬为司马”

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划以州县二级制为主,州长官复称汉朝的刺史,由都督统管,都督下辖州县,州下领县,所以县是地方的基本行政单位。郡县长官由中央任命,负责管理州内政务和县令、地方佐官如司马、司户等,都是协助州郡长官和县令处理政务的。

唐前期时,司马尚且是行实权、掌大权的官职,甚至可以代行刺史、都督之职。这是因为唐初期官员数量不足,皇帝需要将部分行政权力下放给州司马等地方官员,以便他们更好地管理地方。

唐太宗继位后,根据山川形势分全国为10道,至唐肃宗时,道由监察区演变为行政区,此后唐实行道、州(府)县三级制。府州作为道的下属机构使得府州司马等地方官员的权力进一步加强。

但是刘禹锡任司马时,更多的是为振兴当地文风文俗作贡献。同属于中晚唐时期的“江州司马”白居易在《江州

司马厅记》一文中也对自己任职期间的闲散生活有所记载。司马一职似乎在唐中晚期变成了一个钱多事少的闲职,这是为什么呢?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权力逐渐扩大,地方行政事务大多由节度使掌控,刺史与节度使之间权力的转移使作为刺史佐官的司马也受到影响。同时,中央为了限制节度使的权力也会在地方增派官员。到了唐后期,司马一职成为朝廷安置贬谪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些官员从中央发配到边远地区,落差之大往往无心政事,导致司马职位更加闲散,但是它的俸禄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那么,这样待遇优厚的闲职,为什么会被用作贬官呢?只因贬为司马这种名义上的处罚非常适合皇帝来安置犯了错误或因其他原因不得不处罚,但又不想罚得太重的官员。(摘自《国家人文历史》林俞/文)

为什么不结婚的人会更穷

婚姻让人更富有有原因

来看一下美国人的数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经过长期跟踪美国人退休账户,给出结论:平均来说,婚姻状态稳定的人退休前的财富水平是独身者(离婚、丧偶或终身未婚)财富水平的3.8倍。这个差距在低学历人群中更加明显,前者是后者的4倍以上。

在美国,婚姻会给人们带来一些税收上的优惠,但仅此一项肯定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差距。

婚姻能让人更富有吗?沃伦·巴菲特是这么认为的。他用网球举了个例子。网球选手兼网球教育家西蒙·拉默写过一本给初学者看的小册子《出手不凡的初学者》。拉默在书中强调,非职业选手想在社区友谊赛里取得耀眼的成绩,不在于你获得多少个发球直接得分,更重要的是尽量减少比赛里的“非受迫性失误”。更确切地说,业余比赛不是在比谁的网球峰值技术更高,而是在比“在对面的胖子踩到自己鞋带之前,要把球正正经经地打回他的场地”。

普通人的财务决策与此类似,关键不在于你能否发现

第二家苹果公司,而在于千万别把钱交给那些号称每月利息达到8%的P2P公司。正常的婚姻有较大几率可以使投资者的决策水准大大提升,对于那些自以为是的男性更是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除此之外,相对于独身者,婚姻大概也会敦促人们更注重花销的性价比,注意储蓄,夫妻会互相监督,减少非必要花销,为了更明确的未来规划更清晰的财务目标。平均来看,这些都有利于个人财富的积累。

当然,问题也可能有另一个角度的解释,从人们择偶的世俗标准来看,那些原生家庭富裕、心灵手巧、善于与人相处、体魄貌端的人本身就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获得适配人群的好感,他们的婚姻保持稳定的概率更高。既然有钱人和更善于赚钱的人获得稳定婚姻的概率更高,那么从统计结果来看,当然是处于稳定婚姻的人掌握了更多的财富——不是婚姻让人们更富有,而是没钱的人在独身者中占了更高的比例。

从更高的层级来审视婚姻给人带来的“效用”,会怎么样呢?按照感受经济学的说

法,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感受效用比财富数据更具价值。

结婚的人幸福感也更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做过一个关于婚姻和养育孩子对人们幸福感影响的试验,结果也是婚育除了受试人群的表述的客观性值得商榷,对人性的复杂一面也有颇多体现。

婚育组人群在描述婚姻和养育儿童的事务的繁复时,表示那是非常无趣的,但总体上看,他们又觉得那些事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从正常的逻辑看,这不是有病吗?卡尼曼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婚姻和养育下一代,虽然充满无聊和劳累,但更能让人们赋予生活“意义”。这种“意义”来自配偶和被养育者的价值认同。干相对有意义的事,人们的幸福感会更高。

这种提法我本来以为是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人物说

的,后来发现尼采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当然了,我相信独身者的生活肯定不会是度日如年。只不过,平均来说,独身者没有把不用解决夫妻间矛盾、养育儿童而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水平或者让生活更有“意义”——这不能怪独身者们,因为人生本来就没那么多有“意义”的事。

这有点儿像吸烟成瘾者对劝告者的反驳。一个人劝告他酷爱吸烟的朋友:“你如果不吸烟,省下来的钱都能够买一辆法拉利了。”对方反问:“你倒是不吸烟,但你的法拉利在哪儿呢?”

婚姻也许是一种很糟糕的选择,但很可能其他的生活方式还不如它。我没有催人结婚的意思,你依然可以喜欢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摘自《第一财经》2025年第2期 崔鹏/文)

影响唐代历史的粟特小人物

也。”说时迟那时快,安金藏猛地冲过去,拔出旁人的佩刀,毅然剖开自己腹部,顿时热血涌出、肠子落地,晕倒在地,几近断气。

安金藏的壮举,一时震惊朝野。武则天得知后,大惊失色,立即下令用辇舆将安金藏抬入禁中,命太医全力救治。太医为他装回肠子,第二天安金藏奇迹般地苏醒了。武则天亲临探视,感叹:“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她下诏停止此案,李旦得以免于构陷。安金藏此举影响深远。首先,他显而易见地激发了舆论对李旦的同情与支持。武则天也开始反省自己对待子女的态度,最终变“尊武抑李”为“合同李武”。武周政局为之一变,安金藏的壮举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日后,李唐王朝能够复辟,不得不说受惠于安金藏的壮举。其次,安金藏拯救了软禁中的李旦一大家子人,里面就有两位日后的皇帝。一位是二次登基的唐睿宗李旦,另一位则是将大唐王朝推向辉煌巅峰的唐玄宗李隆基。无论从政治转型而言,还是从直接救人角度而言,安金藏都是李旦这一系,也就是之后李唐皇室的大恩人。(据中国国家历史微信公众号 张程/文)

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也最负盛名的广场,是俄罗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场所。整个红场从地面到周边建筑都以红色为基调,一般人认为这便是红场得名的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

红色曾是俄罗斯的吉祥色,在苏联时期,甚至很多史学家称苏联是“三红(红旗、红星、红领巾)时代”,那时红色象征着烈士的鲜血和勇往直前的激情。

其实历史上第一个将红色运用到国旗上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以红色作为革命象征。1905年,圣彼得堡的工人在抗议中效仿法国第一次使用了红色的旗帜。沙俄媒体将起义者称为“海盗、赤匪”,工人武装则自称“红色近卫军”。13年后的苏维埃俄国将红色镰刀斧头旗定为国旗。从1812年的抗法卫国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红色都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主色调。

但是,“红场”之名比俄罗斯人崇尚红色的历史,特别是

莫斯科红场是如何得名的

红色革命史要长得多。15世纪末,号称“全俄君主”的伊凡三世在莫斯科城东设所。整个红场从地面到周边建筑都以红色为基调,一般认为这便是红场得名的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

但是这个繁荣的贸易区在1517年发生大火而被夷为平地。1662年,托尔格重建开张,被改称“红场”。之所以称之为红场,是为了纪念映红了半边天的那次火灾。另一层的含义是,这里的“红”,在古俄语中是“美丽”的意思,“红场”也指“美丽的广场”。但是这个广场在100多年后再一次被大火焚毁,1812年,红场不得不第二次重建。

20世纪20年代,红场第三次扩建时,将邻近的瓦西列夫斯基广场合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为了符合“红场”这个称呼,广场多采用红色的方砖石料建造,从而形成了今日红场的红色风情。

(摘自《人生与伴侣》刘创/文)

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

盖茨创办微软、乔布斯创办苹果、佩奇和布林创办谷歌,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从0到1的过程——操作系统不是盖茨原创的;乔布斯在发明苹果之前,其他公司已有类似的产品;网页搜索在谷歌之前已存在。不过,如果把从0到1的定义,由从无到有改成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最后到商业成功的全过程,那他们又都当之无愧。

发明青霉素例子可以说明,光靠运气或灵机一动,是远远不够的。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偶然的发现,找到了能够杀死细菌的青霉菌,但培养皿中的霉菌并不能直接入药。另一位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注意到了他的研究成果,带领着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从青霉菌中分离和浓缩出青霉素。即便如此,也不足以给人使用。于是,弗洛里说服了英国和美国的各大药厂,投入上万名工程师,一起解决制药中的工程问题。再后来,麻省理工学院



的科学家希恩人工合成出青霉素,这才让这种神药能够量产,而且便宜到全世界都用得起。至此,发明青霉素从0到1的全过程才算走完。

如果不能解决工程问题,只有技术,创新可能就会被埋没。正如一家初创公司打造出一辆能跑的新能源车不是难事,但能够一个月生产出一万辆车,而且保证品质,就是另一回事了。

由此可见,从0到1显然不是有一个好想法或者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就算完成了,而是要走完从想法到技术再到大家真正受益的全过程。只有完成了最后的那个“1”,之前所做的工作才能体现出价值。